“驯顺的肉体”

——《使女的故事》中女性权力斗争解析

刘 辉

(中国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 文章以《使女的故事》中花的意象来解读小说中基列国的使女与嬷嬷、大主教夫人等女性间的斗争,结合福柯的权力观来解析嬷嬷与大主教夫人分别通过对使女意识、行为的规训及孕育的监控,参与基列国权力的实施过程。具体解析使女身陷基列,成为“驯顺的肉体”及后来从事的“非法活动”而进行的对主体地位的积极抗争。

[关键词] 花的意象; 规训; 驯顺的肉体; 主体地位

[中图分类号] I711.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5)05-0114-04

一 引言

《使女的故事》(下文简称《使女》)作者为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赢,她得了加拿大总督奖。小说讲述的是未来的基列国由于环境污染等原因人口出生率下降,以主人公奥芙弗雷德为代表的使女们被迫沦为当权者大主教们生育机器的故事。她们被政权的“监管、信息禁止,‘再教育’中心、极权暴力”^{[1]857}严厉统治和压迫。对于这部小说国内外多项研究从多种角度进行了解读,如国外的权利研究:Kouhestani^[2]探讨了反乌托邦社会中权力和语言的作用;Weiss^[3]认为女主人公并非勇敢的反叛者或值得同情的受害者,而是基列极权的同谋者。也有将之与其他作品进行的对比研究:Wang^[4]比较了《使女》与《黄色壁纸》中遭受不同形式的囚禁和失声的主人公所体验的无边的恐惧和各自的抗争。Thomas^[5]将该小说与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做了对比研究,详细分析了两部小说在6个方面的相似之处。国内研究角度涉及权力、主题、生态等;王莘等^[6]探讨了基列国的权力策略,揭示权力与身体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抵抗。陈小慰^[7]从可及性这一未来小说的着眼点出发探讨了该小说的多样化主题。梁颖^[8]认为小说中作者对北美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是持批评和反思态度的,小说以女性和宗教主题为主,不是严格的生态女性主义文本。张冬梅^[9]等进行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认为女性在被污染的环境中要承受更大的伤害,女性对自然的天

然亲近可以被解读为女性幸存于男权社会的一种策略。

以上研究多涉及权力,但都没有探究体现基列权力实施过程的女性间权力的角逐。关于权力,福柯认为“规训从它所控制的肉体中创造出四种个体,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具有四种特点的个体:单元性(由空间分配方法所造成)、有机性(通过对活动的编码)、创生性(通过时间的积累)、组合性(通过力量的组合)。而且,它还使用四种技术:制定图表;规定活动;实施操练;为了达到力量的组合而安排‘战术’。”^{[10]188}为成功孕育,使女们在基列国的生存空间、活动内容、场所、时间和方式等都有严格规定。因此福柯的权力观可以用来解析嬷嬷与大主教夫人在基列国权力实施中的参与方式与过程。女性们的斗争反映了基列国权力的实施,这一斗争的演变过程可以以阿特伍德的观点来分析。阿特伍德^{[11]36-39}曾经阐述了加拿大文学“四种基本受害者态度”:否认你是受害者这一事实;承认你是受害者这一事实,但将之归因于命运、上帝的旨意、历史的、生理的、经济的或无意识的……或其它更有力更普遍的原因;承认你是个受害者,但拒绝接受这种角色是不可避免的;做一个有创造性的非受害者。

二 花及其象征意义

小说中多次提到的与花相关的词汇:种子、花粉、开花、结果、凋零等分别例证了基列极权对女性及其身体的物化。其中的几色花种也都具有特别的

象征意义,代表了不同的受害者态度,也反映了主体身份斗争的过程。

(一)蓝色鸢尾花:身陷“监狱”的象征

Grace^[12]曾经说过,基列国没有给予主人公奥芙弗雷德,事实上所有女性任何主体地位,因此将其置于客体、自然资源、“长着两条腿的子宫”的地位。使女们的身份只剩下生理性的:她们存在的必要性仅仅体现在生育方面。身处基列,如同身在监狱。

使女们在基列国的身份危机体现在名字的由来、银行账户的冻结以及可以定义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的消失、流动的身份等诸多方面。使女们的命名方式为以英文中表示所属关系的of加上其服务的大主教的姓,如Offred,即“奥芙弗雷德”,意为“弗雷德的”。使女们如“蓝色鸢尾花的水彩画”^{[13]17}一样“由政府统一分发”^{[13]18},在大主教家轮流服务,为大主教诞下子嗣后,将其交由大主教夫人抚养,哺乳期结束后被送往另一大主教家重复同一生育机器使命;若在规定时间内没有生育,就会被送至“隔离营”。在大主教家的这种短期的流动服务抹杀了其个人的特征和欲望。此外,使女们身处多种囚禁。包裹严实的红色使女服及狭小的房间是对她们肉体的囚禁,而亲密的情感和身体接触的禁止以及与他人自由交流、读写权力的剥夺则是对其精神进行的禁闭。在每月一次的授精仪式上,在那由四瓣花朵点缀的白色大帐下,大主教夫人驾驭着整个过程。作为“国有资源”的她对自己的身体和生育能力没有任何控制权,只是“长着两条腿的子宫:圣洁的容器,能行走的圣餐杯。”^{[13]141}

在基列国,纪律“是把单个力量组织起来,以期获得一种高效率的机制……单个肉体变成了一种可以被安置、移动及与其他肉体结合的因素。”^{[10]184}使女的身份没有任何意义,她们都被从自己的本质和原始身份中异化了,只司孕育之职,与其他另有职责的女性一起为高效机器服务。只有浴室里“小小的蓝色勿忘我花墙纸”^{[13]165}联系着主人公熟悉的昔日世界。

(二)百合:被成功“规训”的佐证

使女们接受被油漆掉的“田野中的百合”的店名体现了对自己他者地位的被动接受,也体现了阿特伍德所说的第二种受害者态度:承认你是受害者这一事实。福柯认为人体是可以被权力驾驭、使用和改造的对象和目标。这种对肉体的规训最重要的仪式就是操练,通过尽可能严密地划分时间、空间和活动的编码来进行^{[10]154-155}，“这样,纪律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驯顺的’肉体。”^{[10]156}基列国

女性们理论上似乎分工明确,易于相处,然而这种状况并没有将女性们团结起来,却如Bouson所说:“基列政权有效地剥夺了女性的个体性而将她们转变成男性经济中可替代的物体。”^{[14]43}为了生存,以丽迪亚为代表的嬷嬷们成了基列国“压迫原理的阐释者。”^{[15]83}

嬷嬷通过为使女规定日常生活线路图、活动内容等具体操练使之成为驯顺的肉体。使女们在被派往大主教家之前,都需在红色感化中心接受再教育,被灌输基列信仰:“她(丽迪亚嬷嬷)说,要把自己当成种子,”^{[13]20}见面时的问候语只能是“祈神保佑生养,”^{[13]20}“愿主开恩赐予,”^{[13]20}每日祈祷也慢慢地将使女们的生存意义——“开花结果”^{[13]20}深深根植于她们的意识之中:“哦,上帝,将旧我消灭干净。赐予我果实。克制我肉体,使我得以繁衍。”^{[13]202}使女所受的规训也体现在“habits”一词,使女的裙子被称为“habits”(修女服)。“真是名副其实的好名字,因为该词又指‘习惯’,而习惯是牢不可破的。店门口有个巨大的木招牌,形状像朵金黄色的百合花,店名就叫‘田野中的百合’。这个店名原来写在百合的下面,后来被油漆盖掉了。”^{[13]27}“habits”暗指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接受这被漆掉的店名,意味着对自己在基列国命运的忍耐和接受。

面对这些操练与监控,女主人公唯一可以寄托自己对年轻与纯真年代的眷恋便是那些黄色的水仙、雏菊、毛茛、金光菊和蒲公英等。美好的过去都被“除得一干二净,”^{[13]222}能看到的只有“草坪边上围种着各式各样的鲜花,黄水仙花期将尽,郁金香正竞相绽放,流芳吐艳。”^{[13]13}奥芙弗雷德的灿烂旧时光如黄水仙花逝去,代之以象征着怀孕、生育的红色的郁金香花期。

(三)红色郁金香:“(非)驯顺的肉体”的标识

大主教夫人塞丽娜·乔伊花园里的红色郁金香是身着红色使女服的使女们在基列国身份的具体体现。“这座花园是大主教夫人的领地……是她们发号施令、呵护操心的地方。”^{[13]20}大主教夫人监控使女,也是基列极权的同谋。然而使女们却开始“拒绝接受这种角色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前进到受害者态度三。

郁金香的花型极似女性的子宫,象征着使女在基列国的身份和地位是由她们的子宫和卵巢决定的。作为生命的创造者,使女们在多数女性不能生育的基列国里迫使大主教夫人对其形成一种依赖,这就决定了二者的对立。“你们要当心的不是丈夫,丽迪亚嬷嬷说,而是那些夫人。”^{[13]49}

在基列国,权力作用的另一种方式是监视。“纪律的实施必须有一种借助监视而实行强制的机制……一切权力都将通过严格的监视来实施;任何一个目光都将成为权力整体运作的一部分。”^{[10]194}使女祈祷时,嬷嬷严密监视,稍有懈怠,便遭惩罚。塞丽娜·乔伊在每月一次的受精仪式上的出现既是对未来可能出生的孩子的见证,也是对使女的监视。“‘山谷里的百合’的香味弥漫在我们周围,凉嗖嗖的,几乎有些冰冷。”^{[13]98}

使女以嬷嬷植入的只为繁衍子嗣的使命观审视自己生存的意义:“小径两旁狭长花坛里的郁金香开得更加红艳……可这有何意义?毕竟它们肚里空空。”^{[13]47}在基列,使女有了孩子,似乎就有了地位,有了权力。珍妮是小说中唯一怀孕、生产的使女。怀孕赋予她不曾有的权力,为她赢得了羡慕甚至是嫉妒,她不再是被别人踢来踢去的玩偶,生产时的珍妮“宛若乌云中的明月一般光彩夺目。”^{[13]131}然而她的孩子被大主教夫人视为“一束花,一件战利品,一个供品。”^{[13]131}孩子还是要交由大主教夫人抚养,使女终究得不到权力。

在女人不能生育便被称为“非女人”的基列,女性的身份被定义为她们最原始的共性——生育能力。失去生育能力的大主教夫人无法通过自己的身体来获取这种身份,唯有寄希望于使女。大主教夫人参与使女怀孕、生产的整个过程:从授精仪式上躺在使女上方靠床头处,到使女生产时坐在产凳上方位置,再到后来给婴儿命名,无不显示她是孩子真正的母亲,她以此完成了自己女性身份的构建。大主教夫人虽占有胜利果实,但也意识到自己的屈辱:能拥有但不能生育。因此她借由“对花朵饱满的生殖器发起某种闪电战”^{[13]159}来发泄对使女的憎恨。

奥芙弗雷德开始以一种无言的方式抗争:“你再也用不上这些花了,你已经是残花败柳。花是植物的生殖器官。”^{[13]86}这种想法表明她不再是完全“驯顺的肉体”。女主人公也尝试其他方式复原自己的主体地位:偷花。一次授精仪式后,她决定“凭自己的心愿独自做一件事……找到了水仙……用手指将它掐了下来。我会把它压在某个地方……留给下一个女人,我之后的女人,让她去寻找发现。”^{[13]103}将花“压在床垫子下”,让之后的女人去寻找发现,如同前一任奥芙弗雷德用发卡或是其他东西刻下的划痕,是对自己主体的一种追寻。

“黄色的蝴蝶花”^{[13]159}、“窗外野草上的花粉”^{[13]108}以及后来描写尼克从小路上走下来时的“一团团随风飘舞的花粉”^{[13]188}都表明女主人公重

新看到了美好的时光,看到了希望,也预示着她更积极的抗争。

(四)屋顶花环:“非法活动”的见证

屋顶花环是女主人公的精神寄托,也见证了她的反抗囚禁的斗争。“那个石膏花的圆环……会保护你,”^{[13]221}在自己的房间中,在屋顶花环下,奥芙弗雷德通过幻想和叙述等“非法活动”颠覆基列极权强予她的身份。Beran认为,“找到了语言和讲述的力量,奥芙弗雷德已经从一个受害者迈向……基本受害者态度四。”^{[16]72}“雪白的天花板上是一个花环形状的浮雕装饰,中间是空的。”^{[13]17}那空白处意指女主人公利用多种联想在人类和电子共同监控下的基列重构自己的身份。

奥芙弗雷德开始以各种方式“大声疾呼自己的存在。”^{[13]159}她采用多种方式获取对大主教夫人的权力感:密会大主教、偷藏黄油涂脸、擦手、多次与尼克幽会等。通过回忆,幻想努力保有自己的真实姓名及身份。“我仰望天花板,寻找花环的枝叶……片刻之后……眼前会冒出各种幻想。”^{[13]133}大主教夫人是“花园的呵护者”,“绝不容许有任何隐秘的欲望之花有盛开之机。”^{[13]141}大主教的房间是禁区,女人从不踏入,就连塞丽娜·乔伊也不来这里,而奥芙弗雷德却可以出入,这给了她一种挑战大主教夫人的胜利感。她也很享受在大主教处看书、拼字,这种非法活动连大主教夫人都不曾参与。为了生存和地位,她同意大主教夫人的提议——为了怀孕而与尼克在一起,然而当她发现尼克能带给她一种安全感、愉悦感便开始违背大主教夫人的意愿,努力摆脱钳制,与尼克频繁见面,自由交流。奥芙弗雷德最有力的反抗则是非法叙述自己的故事。她的叙述是对极权政治非人道制度的一种反抗,也是对大主教夫人的反抗。她坚信在未来,在基列国之外有人会听到她的声音。她的叙述为自己赢得了权力,也赢得了勇气。这样她又看到了自己的美好时光:“一些不同的花朵……都是些在盛夏开放的品种:像雏菊和金光菊等。”^{[13]280}

“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构建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10]29}因此,为了专权基列国严控语言,禁止使女书写。奥芙弗雷德使用语言来争取自己的权力。在描绘由大主教夫人实际管理的家时,“一家人:我们是一家……。”^{[13]85}她使用的是“household”而非“family”。因为“family”是一个能表明家人间亲密关系的词语,然而在基列国这种家庭中,成员之间毫

无关爱、信任、亲密可言。这一词汇的选择表明她对强加给她的期望和标准的抗拒^[2]。奥芙弗雷德的叙述冲破了极权的隔离,超越基列国存活了下来。“正是奥芙弗雷德的声音将其从受迫害中解放出来。”^[17]¹¹斗争之后的“花园里空无一人。”^[13]³⁰³

三 结语

本文以花的意象结合福柯的权力观,解析了小说《使女》中以主人公奥芙弗雷德为代表的身陷基列“监狱”的使女们为争取自己的主体地位而与嬷嬷、大主教夫人进行权力抗争的过程,从对他者地位的默默接受到勇敢地讲述自己的故事,成功地完成了阿特伍德所定义的基本受害者态度的转变。尽管女主人公不再是个受害者,还是希望这样一个基列国的斗争永远不会成为现实,更希望看到的是丽迪亚嬷嬷为使女们描绘的那个乌托邦情景:“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女人们,将亲如一家,和睦相处……为了共同的目标团结一心……为……人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花园而奋斗。”^[13]³⁰³

[参考文献]

- [1] Neuman Shirley. 'Just a Backlash': Margaret Atwood, Feminism, and The Handmaid's Tale [J]. 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 2006, 75(3): 857-868.
- [2] Kouhestani Maryam. Disciplining the Body: Power and Language in Margaret Atwood's Dystopian Novel The Handmaid's Tale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nd Social Research, 2013, 3(7): 610-613.
- [3] Weiss Allan. Offred's Complicity and the Dystopian Tradition in Margaret Atwood's The Handmaid's Tale [J]. Studies in Canadian Literature/Études en Littérature Canadienne, 2009, 34(1): 120-141.
- [4] Wang Fanghui. Trapped and Silenced: Claustrophobic Fear in The Yellow Wallpaper and The Handmaid's Tale [J].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2012, 5(2): 10-15.

- [5] Thomas Deborah A. "Don't Let the Bastards Grind You Down": Echoes of Hard Times in Handmaid's Tale [J]. Dickens Quarterly 2008, 25(2): 90-97.
- [6] 王苹, 张颖. 《使女的故事》中的权力和抵抗 [J]. 外国语, 2005(1): 72-77.
- [7] 陈小慰. 一部反映现实的未来小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评析 [J]. 当代外国文学, 2003(1): 162-167.
- [8] 梁颖. 《使女的故事》中生态与女性的“联姻”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2, (5): 101-105.
- [9] 张冬梅, 傅俊. 阿特伍德小说《使女的故事》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J]. 外国文学研究, 2008, (5): 144-152.
- [10] [法]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M]. 刘北成等, 译. 北京: 新知三联书店, 2007.
- [11] Atwood Margaret. Survival: 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 [M]. Toronto: Anansi, 1972.
- [12] Grace Sherrill. Gender as Genre: Atwood's Autobiographical 'I' [C] // Ed. Nicholson, Colin. Margaret Atwood: Writing and Subjectivity: new critical essays. New York: St. Martin's, 1994: 189-203.
- [13] [加]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使女的故事 [M]. 陈小慰,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
- [14] Bouson Brooks. The Misogyny of Patriarchal Culture in The Handmaid's Tale [C] // Ed. Harold Bloom. 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Margaret Atwood's The Handmaid's Tale.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2001: 41-62.
- [15] Feuer Lois. The Calculus of Love and Nightmare: The Handmaid's Tale and the Dystopian Tradition [J]. Critique, 1997, 38(2): 83-95.
- [16] Beran Carol. Images of Women's Power in Contemporary Canadian Fiction by Women [J]. Studies in Canadian Literature, 1990, 15(2): 55-76.
- [17] Reesman Campbell. Dark Knowledge in The Handmaid's Tale [J]. CEA Critic, 1991, 53(3): 6-22.

“*The Docile Body*”

——Interpreting the Females' Power Wrestling in *The Handmaid's Tale*

LIU Hui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The flower imagery in *The Handmaid's Tale* may well interpret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handmaid and the Aunt, the Wife. This paper, in the enlightenment of Michel Foucault's theory of power, reveals how the Aunt and the Wife help to exercise the power in Gilead by disciplining and surveilling the handmaid. It analyzes how the handmaid, the “docile body” in the carceral of Gilead, later fight for the subject status.

Key words: flower imagery; disciplining; docile body; subject status